

# 劳动过程理论视角下农民工身份的生产与再生产<sup>\*</sup>

——以建筑业农民工为例

马子琪, 张广利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对农民工身份的研究,不应忽视其劳动力身份的本质属性,而应从劳动过程和生产体制的角度描述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者状态,以及对于其身份转型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解释。研究以建筑业农民工为例,从劳动过程的角度对农民工身份的生产与再生产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分包劳动体制通过劳动过程的个人管理、工资的弹性支付以及关系控制三种途径遮蔽了劳资关系,消弭了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的职业身份;第二,包工队内部的“庇护—依赖”关系稀释和转化了资本剥削劳动力价值引发的抵抗,用工方式的弹性化使得劳动控制的中心从组织内部的控制走向“市场控制”,分包劳动体制在农民工内部获得了合法性并得以强化;第三,管理者的态度和评价构成了农民工身份认知的主要来源,使其主动与“农民”相联系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表现为对包工制的依赖和认同、对劳资力量不均衡的被动接受以及自我隔离的适应策略。研究认为,生产过程对农民工身份的塑造具有决定性作用,农民工身份最终会通过自我实践被不断再生产。

**【关键词】**分包劳动体制; 关系控制; 身份认同; 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 C913.2; F24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75 (2021) 05-0091-11

由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曾经被认为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主要渠道。经过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很多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放开了对农民工户籍转变的限制,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农民工获取城市户口后仍未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所面临的社会保护不平等以及公平体验落差成为其融入城市的关键阻碍。这些情况的存在导致农民工对转变为城镇户籍的热情大大下降。尤其是对更加理性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不再只是要求身份上的“农转非”,而是更加看重城乡之间的比较利益。少部分转变为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对于自身角色的定位也未能完全向市民阶层方向转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农民工身份并未得到实质性转变,因为他们并没有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以“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和分布趋于稳定,呈现出“群体结构化”<sup>[1]</sup>的趋势。

当前的研究大都从户籍改革、生存权益等制度性安排的角度探究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和城市融入问题,却忽视了农民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和在社会分层中比例趋于稳定的现实。本研究认为,

<sup>\*</sup> [收稿日期] 2021-03-0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系统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6ZDA08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个体化进程中的‘空巢青年’与社会共同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YJA840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马子琪(1992—),女,山东淄博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过程理论;张广利(1963—),男,山东淄博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风险理论。

对农民工身份的研究,不应忽视其劳动力身份的本质属性,而应从劳动过程和生产体制的角度描述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者状态,以及对于其身份转型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解释。

## 一、劳动过程理论与社会身份的内在链接

### (一) 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命题

劳动过程研究最初源于马克思对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这种生产方式的批判。20世纪60年代后,以生产为基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没落,劳动过程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也被长期忽视。直到1974年布雷弗曼出版了《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对20世纪以后的西方科学管理体系进行批判性分析,劳动过程概念被再次提出。迄今为止,劳动过程控制、生产的政治以及工人的主体性构成了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命题。

#### 1. 劳动过程控制

布雷弗曼以西方科学管理体系的核心——泰勒制和福特制作为分析对象,提出控制是管理的核心目的,资本通过严密的控制手段以及细化劳动分工从工人手中夺取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其最终目的是保证稳定有效地获取剩余价值以及消除劳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科学管理的指导下,工人被化约为流水线上从事简单碎片化动作的一个生产工具,必须执行管理者特定的操作命令,最终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和相对自主权。布雷弗曼的研究注意到了劳动控制过程中的“去技术化”现象,由此带来的控制方式的变革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心议题。

其他学者对布雷弗曼的单一控制方式提出了批判,例如:弗雷德曼(Friedman)认为由于存在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抗争的可能性,泰勒制作为单一的控制方式在实践中是很难持续的,实际上管理层会根据需要交替使用“直接控制”与“责任自治”两种策略,直接控制是指对泰勒制管理策略的执行,将工人作为机器的一部分,而责任自治则是赋予工人对劳动过程一定的控制权<sup>[2]</sup>;艾德沃兹(Edwards)认为机器生产技术普及后资本形成了更适应大规模机器生产模式的结构控制,包括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两种方式,技术控制的目标是通过机械化实现工人的同质化,而官僚控制则是通过制定“非人”的各种制度以及不同待遇标准破坏工人的团结<sup>[3]</sup>。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后,随着职业转换、移民等流动要素的出现以及新技术被应用到生产中,将劳动力视为固定商品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工作组织、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弹性被引入到劳动过程组织中,劳动过程控制研究从去技术化的简单控制走向管理方式的多样化过程。

#### 2. 生产的政治

继布雷弗曼之后,很多学者都将关注点集中于对管理方控制方式的讨论,尽管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工人抵抗、劳资冲突的不可避免,但其思想仍然是从资方管理策略的角度考量,主张根据不同的内外因素选择适当的管理策略,保证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生产的延续。直到布洛维将意识形态的维度加入分析范畴,开始促进劳动过程理论从“控制—抗争”模式向“控制—抗争—认同”模式转变<sup>[4]</sup>。他指出尽管雇佣者剥夺了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权,但其带来的结果并不总是激烈的反抗,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们会接受资方的管理思想甚至主动配合这种剥削式的生产方式。资方通过三种途径“制造同意”:“将劳动过程构建为游戏过程,通过内部市场转嫁工人与管理者的冲突,通过申诉、集体谈判等方法建立内部国家”<sup>[5][6]</sup>。基于此,布洛维创造性地提出了“生产政体”的概念,即由政治经济环境造就的,由此导致形态各异的劳动控制模式,并进一步区分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三种工厂制度。

无独有偶,汤普森的核心理论也是对政治经济形式如何嵌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他将劳动过程放在了整个社会历史框架下进行讨论,指出劳动过程理论的中心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本质和转化,其核心理论围绕资本之间以及资本与工人的竞争、资本积累的逻辑、生产资

料转化等方面展开。布洛维、汤普森使得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又回归到了资本对工人剥削的议题上。布洛维将工作场所之外的市场竞争、社会关系、国家干预等宏观力量与劳动过程联系起来,拓展了劳动过程研究的宏观背景,成为解释劳动社会问题主导性的理论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布洛维的影响下其他学者对劳动过程理论过分关注于管理方式和控制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理论忽略了与工作相关的社会因素,如职业、社区、阶级、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再生产问题,提出应该将“工作场所”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环境内,研究不同国家的资本运行形塑劳动过程的实践<sup>[6]</sup>。

### 3. 工人的主体性

“主体性”的研究肇始于对布雷弗曼劳动过程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独立分开这一观点的批判,同时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也影响了劳动过程研究,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观成分逐渐引起了学界重视。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福柯对权力、知识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对于分析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和抵抗具有重要意义,“主体需要被放在社会关系的组成和结构中理解,而不能被单独地简化为经济范畴抽象的逻辑关系”<sup>[5][106]</sup>。奈茨和魏尔马特都致力于在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过程理论,区别在于:奈茨(Knights)采用福柯的理论,试图分析文化和承诺在管理中逐步取代控制和官僚主义后,个体如何构建现代公司内部的话语体系及如何受到其约束等问题<sup>[7]</sup>,认为工人的主体性是由多种规训机制、监控技术、权力—知识策略所形塑的;魏尔马特(Willmott)以马克思的研究为出发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力个体的形塑,并将主体性与身份联系起来,关注两者如何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具体情境下展开<sup>[8]</sup>。在克沃德的研究中,劳动者应该被理解为由社会关系建构而成的研究对象,而非单一抽象的经济类别。在劳动过程研究的后现代转向中,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对“自我”和“价值”的塑造逐渐引起重视,有些学者主张劳动过程的考察不仅要客观上而且要从主观上分析工人阶级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还有些学者将认同、性别、年龄、公民权等因素引入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在承认阶级矛盾的前提下,主体性内化为阶级属性的根本。

#### (二) 身份生产与再生产的解释框架

工人主体性的研究转向标志着劳动过程理论开始吸纳后现代社会学的主流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劳动过程的研究不再被限制在工作场所内,而是将内部控制和由此形塑的劳动关系与市场特征相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与主观意识层面相关的身份认同逐渐引起重视,从中可以抽离出一个身份生产与再生产的解释框架。

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主体的身份是由一系列自我观点组成的,这些自我观点是特定的群体在自我归类或认同活动基础上形成的”<sup>[9]</sup>,身份在社会结构中产生,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结构。主体通过与其他群体的社会交往获得评价,并根据这些评价形成自我认知,从而按照规定的角色行事。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阶级/阶层位置是社会身份形塑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认为,阶级/阶层身份的产生根源于生产关系,这就为我们研究劳动过程对身份认同的形塑提供和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形成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阶级与身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体在社会生产资料中的占有状态决定了其阶级属性,阶级属性及其产生的阶级意识又形成了主体对自我的判断和认同,也即社会身份的形成。阶级属性和社会身份统一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之中,并在劳资关系斗争过程中不断演化出新的形式与特点。

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后结构主义视角将“主体性”和“认同”放在雇佣关系下重新进行了定义,前者表示人类个体开放、反省的和具体的特性,而后者则是指主体性地位的社会组织归属。宏观层面的社会生产方式塑造了个体的阶层身份,这一过程是由体制主导的。身份认同产生于阶级形成过程中阶级意识的发展,这一过程是在劳动中实现的,而进入组织文化的自我与进入劳动领域前的自我的互动产生了新的认同,他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影响了其行为选择,进而

代表了对自身社会身份的理解。在资本积累的主导下,管理者出于维护自身地位和特权需要而使用的多种规训机制、监控技术、权力控制劳动的行为,形塑了劳动者的各种心理结构和性格意识,并根据其反馈调整控制方式,从而使得个体对其身份感到不确定和不安全。脆弱的个体对自己的身份有着强烈的依恋,他会试图去维护自己的身份以消除不安全感,这同时又加强了权力机制或生产方式对自身的控制,并进一步强化了身份认同,再通过个体内化的行为不断重复和更新。

## 二、分包劳动体制及其对农民工主体身份的打造

基于大型制造业提出的劳动过程理论,从产生开始就一直面临着理论适用性问题,这种以科层化管理为分析视角的研究带来的问题是忽视了不同产业生产过程中的差异,尤其是那些脱离了固定、重复自动化生产的行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工业化并没有使得建筑业完全走向机械化、标准化,而是直接导致了建筑设计、工程与生产的分离<sup>[10]</sup>,再加上建筑生产本身具有不可重复性、阶段性、周期长以及易受季节和原材料供应等因素的影响,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这使得科层化的劳动控制在建筑业中无用武之地。建筑业的工人结构、工作条件以及工作形态与完全标准化的制造业有很大不同,工人对生产过程仍然具有一定的控制权。布洛维甚至认为在建筑业引进集中的管理权力是无效的,这种发生在不稳定空间的劳动过程无法保证以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管理。西尔弗对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建筑业内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并不会让管理者减少对工人们的控制,反而会促使他们寻找更多控制劳动过程的方法,控制手段比在固定车间内更加多样。我国学者将社会关系引入建筑业劳动过程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在我国建筑工地内发展出了比布洛维的“制度霸权”更为复杂的“关系霸权”。在资本的控制下,分包劳动体制中的建筑工人形成了徘徊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模糊的身份认同。

### (一) 建筑业改制与工人身份的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转变在建筑行业有明显体现。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的恢复重建工作急需投入大量的建筑业劳动力,各种承包体制应运而生,吸纳了大量建筑从业人员。这一时期的建筑行业以国营性质或集体性质为主,工人的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每月都可以领取到口粮补贴或工资。当正规企业的力量发展壮大之后,各类承包体制被废除,建筑项目改为统一由政府安排。总体来看,建筑业的劳动组织形式是以国家或集体经营的正式用工为主,国家作为一个大单位,对劳动力进行统一安排和分配,工人不但能够享受来自国家全方位的保护,建筑业的劳动过程也带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色彩,建筑工非但不属于苦役,还是受人尊敬的技术类工作。建筑工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国家工人的光荣形象被广泛宣传。

改革开放后,效率成为国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建筑业作为高收益的行业首先被引入了一系列市场改革举措,逐渐成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劳动生产部门。包工制作为一个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强度、加快资本周转的用工方式在建筑行业中再次兴盛。建筑行业的改革,带来了建筑企业内部的双重分离。一方面,国有建筑企业内部只保留少数的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不再自行组织一线的施工队伍;另一方面,管理层和劳务层的分离促使一部分承包人从企业内部脱离出来,通过雇佣廉价的农村劳动力组建施工队伍,由农村包工头带领的施工队成为了建筑行业最典型的用工模式。

与建筑业改制相伴随的是建筑工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直线下降。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工人,今天在建筑施工现场的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将他们的户籍限制在农村,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一个作为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从生产关系上看,他们与公司老板之间是典型的雇佣劳动,但却在包工制的遮蔽下陷入劳动关系缺失的困境中,资本通过拖欠工资、超长的劳动时间以及低劣的福利待遇,以最廉价的方式获取了工人的劳动成果。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以及权利的缺失促使他们形成了介于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第三”身份认同,以及模糊的职

业认同。“农民工”的身份给了这些城乡迁移者们说服自己去接受在城市中不公地位和待遇的理由,也成为资本剥削劳动力价值的有效工具。

(二) 分包体制中的劳动控制

在科学管理理念中,管理者凭借“去技术化”导致工人的劳动技能在生产过程中的降格运用以使其更加依附于自己。尽管建筑业的生产过程存在特殊性,无法直接使用科层化的管理模式,但建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预制产品的大量使用仍然降低了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绝大多数的工人被降为非技术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大大降低。劳动过程与工人技术的分离同时带来了临时用工的增加,这就使得分包劳动体制代替机器生产中的直接控制成为建筑业生产管理的核心。

经过市场化改制,层层分包成为当前我国建筑业生产体制最重要的特点。如图 1 所示,分包制的格局呈金字塔形,位于最顶端的是开发商,也是整个建设项目的发起人,他们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建设项目发包给建设单位,由其将项目进行肢解后转包给各专业施工队或是劳务企业,然后由后者按照不同工种或项目转包给包工头。包工头一级可能直接负责工人的招募与管理,也可能进一步肢解工程分包给规模更小的包工头,农民工在包工头的带领下进入工地。劳动过程的个人管理、工资的弹性支付以及关系控制是建筑业生产中常用的管理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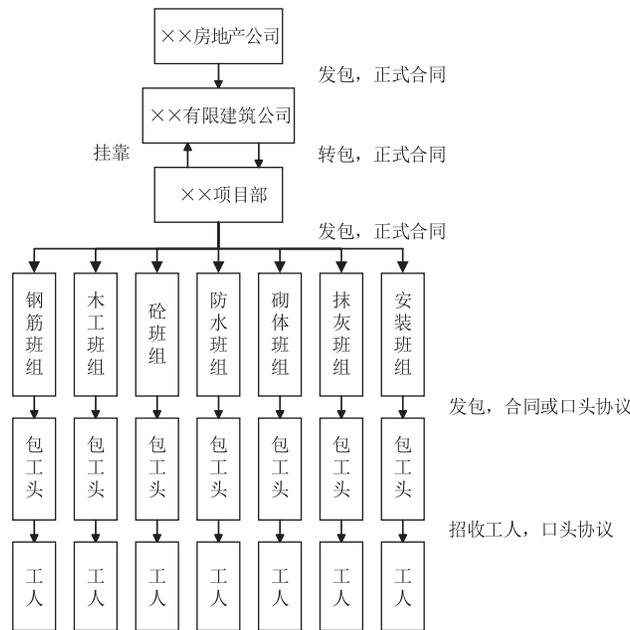


图 1 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架构

首先,建筑业的劳动管理过程充满了个人色彩。建筑业生产的特殊性使其不可能像其他工业生产那样实行每一道工序的严格检查和对生产频率的控制,工人的劳动在包工头或是带班的个人安排下进行,每天的工作任务由他们按照生产进度分配,包吃包住也被作为管理工人的一种方式。这就使得包工头获取了对工人全面控制的权利,不但工人的工作任务由他们来安排,甚至其休息休假、工资支付乃至日常生活,都要在他们的监控下进行。

其次,垫资施工塑造了中国建筑业特有的大规模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房地产资金投入巨大,开发商都是从银行贷款出来开发项目,遇到市场不景气时,银行贷款跟不上项目进度,所需的工程款只能由建筑公司垫付,建筑公司再将垫付资金的压力转移到包工头身上。经过层层垫付之后,建筑工地上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债务链,从开发商一层就开始欠债,债务逐渐下移,处于分包制底层的农民工工资就自然不可能按时支付。包工头每月以生活费的形式支付给工人少量的零花钱,其他工资要等到年底结账或是工程完工后才能拿到。通过这种方式包工头不但将工人们牢牢地控

制在工地上,更有效地实现了对整个生产过程的监视。

最后,在分包劳动体制中,包工头和工人间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但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他们之间存在老乡、朋友关系,工人对包工头的认同与服从,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以先赋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被包工头直接从老家带出来,有些是在打工时结识,在进入包工队之前就已经形成情谊。这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包工头以复杂的网络关系控制了工人,同样也限制了工人对于自己权益的争取。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基于建筑业特点形成的分包制是适应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并根据劳动力模糊身份的特点形成了个人化、关系化控制体系。它不但满足了弹性生产的要求,也便于资本根据工人的反应随时调整管理策略。不同于大规模机器生产模式的结构控制,分包劳动体制意识到了工人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而使之成为一种相对温和、可接受的控制形式,掩盖了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事实。

### (三) 制度与职业身份的双重异化

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下,农民工从单一从事农业劳动生产的农民身份,转变为具有工人与农民的双重身份,首先是由制度安排决定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承担的社会资源配置功能将进城打工的农民设定为制度规定之外的“非市民”,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底层的被雇佣者,它构成了农民工阶层及其身份的重要背景。制度安排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刻画了农民工成为城市“二等公民”的原因,但是真正将农民锻造为工人的,并不只是农民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出来的状态,而是他们进入的各种生产过程。农民工之所以进入城市并不是正式制度安排的设计,而是为了尽快进入生产过程,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收入。因此对于农民工身份的理解必须返回生产的中心性,绝不能忽视生产过程对农民工身份塑造的决定性作用。

根据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阶级阶层位置是社会身份形塑的关键因素,而阶级身份的产生根源于生产关系。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中论述工人阶级的形成,其前提是工人与资方签订了平等的契约,而中国农民工的现实情况是,城市化推动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被雇佣者,但是他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身份,制度身份的异化使其难以与资本之间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农民工劳动价值被资本严重剥夺,分包劳动体制成为了资本控制劳动的手段之一。工人被带入一种乡缘遮蔽下的平等劳动关系缺失的困境中,包工头既不需要按月支付工人工资,也不需要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资本以最廉价的方式攫取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农民工的工人身份被私人关系遮蔽起来,在物质待遇、劳动权益甚至在法律和社会认可度上,农民工都与城市工人的阶层位置截然不同。这种以关系霸权为基础的工地政体导致的结果是,农民工群体被当作满足城市空间生产需要的临时性劳动力来对待,不仅被商品化,更被原子化,强化了其成为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劳动力的命运。

## 三、抵抗与控制: 抗争力量消解与生产方式强化

为了获得工作,工人必须提供劳动力,而管理者则希望从购买劳动力中无限制地获取更大的价值。而劳动力总是体现在具有自己利益和需要的工人身上,工人具有抵抗将其当作商品的权力,工人与雇主间利益的抵触必然会产生冲突。面对工人的反抗,雇主们开始重组劳动过程,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控制结构,甚至改变工人的反抗意愿来减少工人的抗争机会,这一过程在建筑业中表现为包工头对关系以及弹性生产方式的利用。建筑工人以追讨工资为底线原则的抗争行动与资本为了掩盖剩余价值实施的“同意”手段之间的斗争共同在工地中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生产政体。

### (一) 底线规则: 建筑业农民工的抗争特点

为了追逐利润,资本弹性积累的内在逻辑要求建筑业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强度、

资金灵活周转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资本的贪婪本性使得劳资关系及其劳动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一个工程被层层肢解后, 利润也被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分割, 建筑业农民工陷入了比制造业农民工更加残酷和扭曲的价值剥削之中。

然而面对劳动过程中经历的各种不平等待遇, 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反抗意识, 仅仅会在讨薪等极其严峻且涉及基本生存的问题上采取零星的抗争, 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呼应和联合。他们的日常抗争多围绕年底结清工资、遭遇生产事故后得到合法的补偿进行, 而签订劳动合同、要求职业培训、带薪休假等最基本的工人权益并没有提上日程。从中可以看出生存伦理支配着建筑业农民工的抗争方式, 当他们面对日常劳动过程中的控制时, 更多的是以消极、平缓的方式表达自身的不满, 只有在涉及人身、工资安全等“底线规则”时才会采取其他更为激烈的方式来追讨工资。于是建筑行业内劳资对立的矛盾纷纷集中到欠薪问题上, 工人们围绕“讨要血汗钱”与老板展开了利益受损的防御性斗争。在建筑业这样的传统产业中劳动控制方式是影响工人的阶级意识形成的关键因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尽管欠薪和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经常使得工人产生对资方的不满和怨恨, 但是这种处于萌生状态的对立情绪并未发展成为明确的阶级意识, 而是被具有遮蔽劳动关系功能的外包劳动体制稀释和转化了。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道德抗争和捍卫底线的色彩。

## (二) “庇护—依赖”: 抗争力量的消解

包工制对于劳动力价值的剥削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也在明令禁止建筑业内的转包、违法分包行为, 但政策落实情况并不乐观。在全国各个工地中, 包工制作为一个施行有效劳动管理和组织生产的控制手段仍在广泛施行, 建筑工人也对此表现出较大的认同与忍受, 甚至会主动参与其中。令人疑惑的是这种带有明显剥削性质的用工制度是如何在工地中长期存在的, 或者说包工制是如何获得工人认同的。

诸多对包工制的研究普遍认为, 先赋性社会关系在包工队的组织管理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它不但是组织劳动生产的手段, 而且成为了可利用的权力资源, 用于约束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不满。虽然很多时候工人意识到了自己所遭受的不合理待遇, 但因为与包工头之间的私人关系而选择忍受或是温和的反抗, 甚至进一步生产了支持、认同与忠诚。有些学者将这种特殊的权力形态称之为“关系霸权”<sup>[11]</sup>。而在笔者看来, 单纯依靠关系来压制不满并不能获得工人的“忠诚”, 包工头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实质上是农民工允许下的“霸权”, 两者间更倾向于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下的互惠交易。

首先, 包工头组建包工队伍要么依靠共同的地缘关系, 要么依靠血缘姻亲, 这是农民工进入工地的主要方式, 也是包工头组建包工队的主要途径。其次, 包工头并非总是站在农民工的对立面, 包工队的组建可以看作是包工头通过劳动力配置经营劳动力资源的活动, 其最终目的是获取利润。为了维持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和组织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 当面对来自建筑公司、开发商等管理层的剥削时, 包工头会站在农民工的角度, 为他们提供庇护。最后, 国家、制度力量的缺位使得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不得不依附于包工头。不同于工厂的科层化管理, 农民工从进入工地开始, 日常生产的安排、工资结算以及包吃包住的工作“福利”, 使得他们工作之余的生活都需要依赖包工头进行。庇护—依赖的交织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被一层温情的面纱所掩盖, 农民工以包工头为核心在工地这座孤岛中形成了一个临时的生产共同体。

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基于情感和责任维度的“家长式庇护”形塑了工地中的劳动控制与反抗策略。同质性的文化、关系网络使得农民工在政府、制度力量缺位的场域中不得不依附于包工头; 包工头基于互惠关系和维持劳动力供给的理性考量, 不但要安排、组织生产, 也要为农民工在陌生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和安全负责。这种依赖—庇护关系的存在使得相互信任和隐形契约具有了更好的基础, 关系的利用成为资本分化工人团结和加强生产控制的重要手段, 消弭了劳动现场的硝烟,

农民工在短期利益的约束下自愿接受管理，成为了包工制的维护者，抗争意识被不断消解。

### （三）被接受的控制：新经济形态下的用工弹性化

在布洛维的笔下，大型现代化、有着强大工会和稳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企业采用一整套组织、改造或压制生产中的关系的方式让工人认同<sup>[12]</sup>。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他研究的那个工厂之外，大工会、稳定雇佣体系早已出现崩解重组的征兆，欧美发达国家为了摆脱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引致的频繁劳资冲突，以及在日本企业竞争的激发下，采用精益生产、弹性专业化等方式来取代大规模生产和手工生产，其特点在于尽量减少不能增加产品最终价值的“浪费”，诸如监督活动、质量控制、维护和清理工作等，同时以弹性技术和范围经济应对迅速变化的市场。这些新型的控制形式以合作、共赢、效率等意识形态加以包装，表面上消除了劳资间的冲突与对立，更容易为工人所接受。

精益理念的引入对建筑业的劳动生产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劳务用工方式分化为三种形式：劳务内包、劳务外包以及劳务派遣。其中劳务内包与外包沿袭的是传统的“包工队”模式，总承包方将工程分项肢解分包给专门的劳务公司或是施工班组，然后再下放给大大小小的包工头，队伍相对固定；劳务派遣则是总承包企业将不适合劳务分包的工程承包给劳务派遣公司，由劳务派遣公司提供务工人员并长期使用，包工头一般只保留少数的核心工人，然后依据工程量随时调整雇佣工人数量，工人与老板之间只存在短期的雇佣关系，最多持续几天甚至只有几小时，随用随招，按日付薪。这种用工方式不但能够随时适应生产变化的需要，对于农民工来说也有效地规避了欠薪的风险。

相较于固定包工队伍，用工的弹性化使得包工头对工人的控制和管理变得更加方便和容易，只需要对工人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进行监管和控制，工人拥有极大的工作自主性，也大大减少了劳资冲突和矛盾的可能。这种短期、不稳定的雇佣模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工人推崇和接受。然而劳动力雇佣的弹性化看似使得农民工脱离了包工头的控制，表面上是一种独立的劳动形态，但实际上其“卖命工作”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工地政体”中的工人。由于没有固定的老板，农民工长期处于一种半失业的状态，必须通过尽量释放自己的劳动能量来换取收入，大多数工人每日的工作时长远远超出了工地规定。在这种“自我生产政体”<sup>[13]</sup>中，劳动者进行了自我的监督，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赚钱需要，另一方面更是市场在隐性调配的结果。而工人在工作中获得的工作自由是以损失劳动权益保护为前提的，虽然单位时间内的工资收入得到了提高，但是生存的压力和激烈的竞争迫使他们延长工作时间，其后果是他们陷入了资本更严厉的控制之中。临时性的雇佣关系实质上仍是传统包工制的延续和演变，劳动控制的中心也从组织内部的控制变成“市场控制”。

## 四、“制造同意”：自我认同与农民工身份的內化

### （一）“他者”的认知与评价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的基本观点，人们对于自己和他人身份的确定，是在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身份的生产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身份认知主要来自包工头或带工等直接管理者以及管理层的间接管理者的评价。

在建筑工地中，工人的招募管理、工资支付甚至日常生活都是由包工头或是其指派的带班负责，他们直接管理工人的劳动过程，对工人的情况最为了解，也更知晓其本性。大多数包工头对农民工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评价：工人应该是简单的服从者，在劳动中只需要听从安排。包工头对待农民工的具体态度还会受到工人劳动价值的影响：那些掌握特殊技能、口碑声誉良好的“骨干”一般都能够得到包工头客气的对待，包工头甚至会为了防止他们流失而为其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更高的工资；而那些没有特殊技术，在劳动中只能从事纯体力劳动的普通农民工通常不会受到重视，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包工头在施工当地招募的临时工，工程一结束就会被辞退，这部分工人也

是数量最多的一类群体。在建筑业劳动力的买方市场, 包工头在劳资交易的过程中处于绝对优势, 在与农民工的交往中也维持着一种强势的姿态, 利用呵斥、谩骂、欠薪等手段规训工人服从管理。

间接管理者则是指在工地中负责现场监控、材料管理、实名制门禁、财务预算、项目办公室等多个管理部门中的人员, 他们与一线工人没有直接的工作互动关系, 对工人的了解相对有限, 主要依靠日常工作中的间接观察形成对工人的认识。这部分群体有些是从包工头转化而来, 有些是建筑公司中的正式职员, 拥有城市居民的身份, 他们对农民工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印象。虽然处于相同的工作场域, 农民工在他们的眼中只是短期内受雇佣的劳动力, 应当服从工地管理、遵循统一安排, 不应当有违反秩序的自主意识。罚款是工地上的管理层用来规训农民工服从管理的常用手段。与掺杂了先赋性社会关系的包工队不同, 工地管理人员与农民工之间仅存在工作关系, 秉持能不交流就不交流的原则, 当双方发生冲突时, 一般通过其所属的包工头沟通解决。在管理层的眼中农民工被当做无差别的群体来对待, 管理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消除劳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保证稳定有效地获得剩余价值。

### (二) 农民工的主观体验与群际比较

劳动过程中互动主体的态度和行为塑造了农民工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理解, 他们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 也不是完全的工人。他们将自身的身份同“农民”相联系, 尽管他们一年之中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城市的工地中, 与农业生产并无联系, 但是建筑工地作为一个特殊场域圈定了他们的生活, 使之接触不到城市, 日常交往的是经历相似的工友、包工头或是管理人员, 圈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与城市工人有着本质区别。

“农民工”身份已经深刻融入工人人们的日常思维, 笔者在田野调查时虽然竭力避免使用“农民工”的称谓, 代之以“工人”或“一线工人”等称呼, 但在与工人的交谈过程中, 发现他们经常会以“农民工”来自称, 并对此表现出习以为常的态度, 甚至用以自我调侃, 群体内的自我界定十分鲜明。他们在心理上就认定自己是被排除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的边缘群体, 自觉地与城市社会中的居民群体相区别, 清楚意识到自身“外来农民工”的身份。有些工人提及, 当他们戴着安全帽出去坐公交车时, 周围人的眼光以及躲避行为让他们感到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 一种基于职业特征的群体意识与身份意识在与外群体比较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建筑业入行门槛低、劳动力需求量大, 几乎不需要培训就可以上岗, 很多刚从农村出来的农民都会选择这个职业。正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再加上分工的细化使得劳动内容简单、重复性强, 导致工人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几乎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资本和管理人员将其当作无意识的劳动力来对待, 很多工人难以从工作中获得足够的自我价值感, 更加把自己归类为“没有出息”“下苦力”的人。在与工人的交流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文化知识、财富的崇拜, 希冀下一代通过教育获得更多的职业选择, 实现阶层的跨越。

### (三) 自我认同与主体性行动策略

在资本软硬兼施的控制下, 建筑业农民工被改造成符合资本要求的产业大军中的一员, 主动认可了分包劳动体制的劳动特点及其管理方式, 对劳动产生了类似布洛维所说的“同意”。这种同意进而影响到他们对自身身份的理解和认知, 并按照人们的角色期待行事以及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 其边缘身份通过个体的行动被不断再生产。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包工制的依赖和认同。虽然国家近年来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和准则, 禁止以个人的名义分包劳务, 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 包工头通过挂靠劳务公司的方式组建包工队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一方面劳务公司以收管理费的形式将合法资质租借给无公司经营的个人包工头使用; 另一方面一线施工的劳务用工被私人包工头垄断, 包工头仍然是农民工进入工地的主要渠道。长久以来的行业惯性使得农民工习惯性依附包工队进行劳动, 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 也没有要求合法权益的自觉。面对国家的监管, 即使农民工以个人名义办理了工资专用账户, 但实际的工

资支付方式仍然没有发生改变。与包工头之间的私人关系赋予了他们相对安全的感受,使其对包工制产生了忠诚和认可。

其次是对劳资力量不均衡的被动接受。在建筑业劳动过程中,农民工的主观体验既源于对包工制的主动认同,也源于工人在面临劳资力量不均衡时的被动接受。无可否认,建筑业农民工对资本及其控制方式、劳动条件等的不满确实存在,但大多数工人应对不满的方式只是在质疑后继续工作,或者换一个相对待人友善、可靠的老板,很少也很难从建筑行业中脱离出来。他们自知文化程度和专业技术不高,除了建筑行业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没有足够的底气与管理者抗衡,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再加上机器代人的发展使得建筑业用工逐渐减少,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体竞争愈发激烈,农民工逐渐被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很难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因此在面对资方的权益侵犯时,只能进行“野猫式的抗争”。

最后表现为自我隔离的适应策略。由身份认同衍生出的底层化意识加剧了群体内的封闭性。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同及异化的劳动体验使得底层化意识从建筑业农民工的日常劳动经验中逐渐酝酿生成,由此令他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听天由命的宿命观、安于现状的生活观、疏于合作的社群观、盲目排外的人际观等底层群体特有的价值观念。他们在社会交往上更偏向于老乡亲友等熟人圈子的小圈子,外部交往封闭,社会支持性资源匮乏;日常生活局限在工地空间中,以“打牌闲聊、搓麻看剧”等休闲娱乐活动为主,内容和形式十分单一。面对被挤压的生存空间,农民工群体主动选择了“自我隔离”的适应策略,从而进一步拉远了与城市的距离,形成一种群体“内卷化”的倾向,逐渐呈现出一种自我凝固状态。

## 五、结语

本研究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对农民工身份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进行了分析。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的一种新的社会身份,是为了适应社会与经济关系变革以及资本的需求而被创造出来的。在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和制度身份就经历了一次被体制塑造的过程;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了被资本塑造的过程。因此制度和资本就成为了思考农民工阶层形成的两个重要维度。

通过研究发现,农民工制度性身份导致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分裂,因此就必然导致非正式生产关系的形成。而分包劳动体制通过社会关系建立的雇佣关系不仅是资本利用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下也可以看作是包工头们与建筑工之间利用关系信任整合的利益相关共同体,因此劳动控制与工人的自主性同时并存,这种用工模式导致工人的劳动体验远比布洛维描述的“同意”更加复杂。尽管随着用工的弹性化,工人享有了一定的工作自主权,但实际上工人被抛到更广阔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之中,资本对工人的劳动过程控制更强,也更具隐蔽性,并强化了他们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同。为了抵御市场经济的变化无常,农民工倾向于利用自己熟悉的知识系统来对抗未知的风险,形成了保护自我的防御机制,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家政策难以落地,农民工身份在自我实践中被不断再生产。从这个角度来说,回归到劳动过程本身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

从市民化的视角来制定宏观战略,清除制约其发展的制度障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市场经济发展带来行业分割与就业歧视的同时,也为农民工群体打开了职业上升的通道,在农民工难以通过政治、教育等途径实现地位上升的发展阶段,从就业角度入手提升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营造公平的收入分配环境,应该成为当前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有力举措。从国家的角度,需要加强劳动执法,维护农民工群体正当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养老、医疗、工伤、住房等社会保障,破除拖欠工资、用工歧视等违法行为;从市场与企业的角度,需要解决劳动合同、劳动安全管理、合理劳动时间等疑难问题,积极开展劳动技能、安全操作等各类培训;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需要破除由于身份劣势而形成的底层化意识,防止从意识上趋向自我边缘化,在充分发挥专业技术

优势的同时, 努力完成从城市打工者向现代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型。

#### [参考文献]

- [1] 徐法寅.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及其劳动体制分析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9(2): 74.
- [2] FRIEDMAN A L. Industry and labour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78.
- [3] EDWARDS R C.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112-145.
- [4] 王晓晖. 劳动过程理论: 简史和核心理论 [J]. 前沿, 2010(10): 88.
- [5] 孙兆阳. 劳动控制与抵抗: 西方劳动过程理论评述与启示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3(15).
- [6] ELGER T, SMITH C. Assembling work: Remaking factory regimes in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in Britai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59.
- [7] KNIGHTS D. Subjectivity, power and the labour process [M]//KNIGHTS D, WILLMOTT H. Labour process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297-335.
- [8] WILLMOTT H. Subjectivity and the dialectics of praxis: Opening up the core of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M]//KNIGHTS D, WILLMOTT H. Labour process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336-378.
- [9] 黄希庭, 毕重增, 苟娜. 身份及其相关研究进展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3): 8.
- [10] 赵伟. “双重特殊性”下的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对于建筑业劳动过程的分析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5): 49.
- [11] 沈原. 市场、阶级与社会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94-270.
- [12] 赵伟. 劳动过程理论的拓展与转型——21世纪以后的演变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0(2): 41.
- [13] 黄志辉. 自我生产政体: 被忽视的劳动形态——来自城郊农地与建筑工地的两类中国经验 [J]. 青年研究, 2013(1): 40.

##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Process Theory

——Taking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or Example

MA Ziqi, ZHANG Guangli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 should not ignore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eir labor identity, but should describe the new forms of labor and labor stat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process and production system, and explai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ir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Taking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bor proc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the subcontracted labor system concealed the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hip through personal management of the labor process, flexible payment of wages, and relationship control, and eliminated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econd, the "shelter-dependence" relationship of the internal contracting team dilutes and transforms the resistance caused by capital exploitation of labor value, the flexibility of employment methods makes the center of labor control move from internal organization control to "market control", and the subcontracting labor system in migrant workers gains legitimacy and has been strengthened; third, the manager's attitude and evaluation constitute the main source of cogn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making them actively connect with "farmers" and adopt corresponding action strategies,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ir reliance on the contract labor system and recognition, unbalanced passive acceptance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and self-isolation adaptive strategie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has a decisive role in shaping the 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 will eventually be continuously reproduced through self-practice.

**Key words:** subcontracting labor system; relationship control; identity recognition; reproduction

[责任编辑: 邵慧萍]